

“十大”系列丛刊



十大史学家



朱维群等著·上海古籍出版社

K825.8

38

“十大”系列丛刊

十大史学家

B253/02



裴汝诚 朱维铮 等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B442422

“十大”系列丛刊
十大史学家
裴汝诚 朱维铮 等著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.875 插页 5 字数 110,000

1989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15,001—27,500

ISBN 7-5325-0626-6

K·60 定价: 2.70元

前 言

在伟大祖国的历史上，产生过一大批令人敬仰的史学家，司马迁、班固、刘知几、杜佑、司马光、袁枢、马端临、黄宗羲、钱大昕和章学诚等，就是这些史学家中的佼佼者。

有人说，历史总是让人往后看，脱离了现实的追求和奋斗。这是个大误会。历史是今人的祖先昨天或前天的生活记录，尽管其中有的被扭曲，有的被颠倒，但是，人们一旦拨开迷雾，历史则是富于启示的，可以比较，可以鉴别，人们也就会更好地为现实而拚搏，为理想而奋斗。历史画卷上，有鲜艳的花朵，也有可憎的垃圾，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，则取决于个人的鉴赏能力了。这

里介绍的十位封建史学家，曾在各自所处的时代作出巨大的贡献，也对以往的历史有过记述和评说，其中许多见解，迄今尚能发人深思。

有人说，历史上见到的只是保守、自私和专制。这就是更大的误会了。司马迁汲取前人成果，创造性地写出了不朽之作《史记》，成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。司马光完善编年史书，创作了《资治通鉴》。刘知几评论了唐以前的史学长短，史家优劣，章学诚发扬了刘知几的评论精神，总结了封建社会的史学理论。刘、章成为封建时代史学理论方面的两颗巨星。杜佑和马端临在史志的基础上，结合唐宋时期各种典章制度日益严密、日益发展的实际，先后写出了《通典》和《文献通考》两部典制体通史。袁枢首创纪事本末体，黄宗羲首创学案史，钱大昕系统地对历史典籍进行考异，所有这一切，都是冲破学术保守，开展创造性工作的结果。他们面临的社会环境和家庭境遇各不相同，但在屈辱、贫贱、坎坷和官禄面前，都矢志不移地追求学术。封建制相对奴隶制说，曾是一大进步，集权统一与混乱割据比较，也曾显现出它的合理性，对于这种问题，只能取历史主义的态度，正像一个人不能用自己的成年期否定孩提时代一样。因此，对于历史上存在过的保守、自私、专制等落后、腐朽的内容，决不能视作历

史的全部，更不能看成历史的主流。这里介绍的十位史学家，生活在封建时代，他们的著作自然是那个时代的产物。但是，“化腐朽为神奇”，正是鉴赏者的鉴赏结果——鉴往而知来。

裴汝诚

一九八八.三.

目 录

1	前 言.....	裴汝诚
1	司 马 迁.....	朱维铮
47	班 固.....	朱政惠
62	刘知几.....	赵 浚
80	杜 佑.....	严文儒
99	司 马 光.....	裴汝诚
114	袁 枢.....	邬国义
135	马端临.....	戴扬本
157	黄宗羲.....	仓修良
175	钱大昕.....	李培栋
191	章学诚.....	仓修良

司 马 迁

一、小 引

上个世纪初叶，黑格尔在著名的《历史哲学》演讲录里，便曾说过：“中国‘历史作家’的层出不穷、继续不断，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。”“而尤其使人惊叹的，便是他们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。”（《历史哲学》，王造时译，三联书店1956年版，页161、163。黑格尔在讲演中没有直接提到司马迁，但德国是选译《史记》最早而最多的西欧国家，今存《史记》德译本，最早发表于1857年，参见王尔敏编《中国文献西译书目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，页527—531）

列在中国历史上大史学家名单上的，第一

位无疑当数伟大的史学名著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。

然而，生活在二千一百年前的《史记》作者，尽管给古中国众多的人物写过传记，从英雄豪杰到引车卖浆者流都没有忘记，尽管对自己的家族史和著作史也没有忘记，却竟然忘记在自序中补上一笔，介绍自己生于何年何月。同时，他在晚年致一位死囚朋友的信里，述说了对于生死意义沉思后的独白，留下了千古传诵的“死有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”的名言，(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)但以后就神秘地失踪了，没有留下任何材料可供人们判断他卒于何年何月。

由于《史记》的巨大影响，使后人对于作者的谜一般的生平，更加好奇，因此考证日多，歧说愈甚。《史记索隐》、《史记正义》的作者司马贞和张守节，属于八世纪初叶的同代人，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代便提供了不同说法。后代学者据此争议更加热烈。本世纪初，王国维的名文《太史公行年考》发表，断言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(前145)，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(前86)，大概活了六十岁，这以后总算暂时众喙息响。

不幸王国维的考证行文匆促，留下疑点很多。四十年代李长之已作纠缪，认为他将司马迁生年算错了十年。五十年代，人们准备纪念这位世界

文化名人诞生二千一百周年，郭沫若作了《〈太史公行年考〉有问题》一文，得出与李长之同样的结论，重开了关于司马迁传记的三十年争端。

于是，我们讨论司马迁和《史记》，仍不能不从清理历史事实做起。

二、“天官世家”

司马迁，是复姓单名，字子长。出生于西汉左冯翊夏阳县，故城在今陕西省韩城县南。离夏阳故城西北不远的高门原，又称马门原，就是司马迁怀念的故乡。

夏阳在黄河西岸，与汾阴隔河相望。距离故城东北百余里，便是相传由夏禹凿开的龙门。它那壮丽的自然景观，已足以催人遐想，而这里作为河东河西的津渡，在楚汉相争之际，曾留下过韩信巧用疑兵计偷渡击破魏王豹大军的故事，更增添了它的传奇色彩。《太史公自序》自报“迁生龙门”，而不按自己立传惯例说是“夏阳人也”，显然是为自己生于英雄的神和英雄的人建功立业之地而感到自豪。

可惜，司马迁忘记交代自己“生龙门”时在何年。据我考察，以李长之、郭沫若的考订比较可信，就是说他生于公元前135年，当西汉武帝建元

六年。

建元六年，控制朝政长达二十二年的窦太后死了。她的孙儿汉武帝，这时已二十一岁，从此开始了他个人将近半个世纪的真正统治。在把老祖母尸体送进棺材之后，这个青年皇帝转身就改组政府，重新任命自己的母舅担任丞相，随即恢复被老祖母绞杀了的制礼改制的事业，打击藩国势力，限制贵族特权，建立由地方推荐和御前考试以选拔才士的文官制度，并在此过程中实现集权于君主一身。如此等等，都是在用儒术代替黄老术的名义下进行的，历史上便称为“独尊儒术”。

司马迁便降生在中国文化的这个重大转折年头。

正象屈原自称“帝高阳之苗裔”一样，司马迁也把自己的家世追溯到传说中的颛顼高阳氏时代。据他说，自己的远祖，便是自颛顼至夏、商“世序天地”的重黎氏；到西周宣王时，才失去职守而变成司马氏，但仍然“世典周史”；直至春秋早期，才因周王室内乱，举族迁居晋国的少梁即后来更名的夏阳；此后宗族星散，有一支流入秦国，就是他的直系祖先。

司马迁的本意在于证明司马氏是有悠远历史的天官世家，却无意中透露了他们父子何以被汉武帝选中，而相继担任太史令的原因。

为什么这样说？据司马迁自述，从他的九世祖司马错入秦起，便弃文就武，世代为秦将；不幸七世祖靳追随白起犯下活埋赵国降军四十万的大错误，同白起一道被迫自杀；从此家族日趋破落，他高祖便改任铁官，曾祖在汉初又降为管理集市贸易的市长，祖父只剩下军功爵第九等五大夫的空名，类似近代的退役上校，只在本乡享有免费乘车之类小特权。由于汉代军功爵可以花钱购买，司马迁也没有提到祖父上过沙场，因此可能自他祖父起，就已沦为平民，无非靠祖上余荫略有田产牛羊，还能混充绅士。

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，大约家道破落得连空爵位也买不起了。然而如同所有破落户子弟最爱缅怀祖先的光荣一样，司马谈记起了远祖的显赫历史。上古巫史不分，都是巫师，只是巫主接神，史序神位。但神职的分工，却导致被称作史的巫师，因为记录群神出没序列等需要，首先掌握了文字，逐渐由专记神事到兼记人事，变成古代有学问的宗教家。甲骨文研究已表明商代卜人是世袭的，既是宗教官又是档案官。所谓重黎氏“世序天地”，所谓司马氏“世典周史”，从这点来理解，很可能是真实的。证以司马迁晚年自白，“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，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”，更说明司马谈已沦为布衣，选择了远绍先祖以重

振家声的道路。

然而司马谈继承的并非“家学”。《太史公自序》记载过他的学历：“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，受《易》于杨何，习道论于黄子。”就是说，他的学问都来自异姓学者。

唐都是西汉著名的占星家，占星一定兼通天文学。杨何是汉初易学大师田何的再传弟子。《周易》在秦朝免于焚书之祸，因为被看作占卜书。汉武帝仍然用它来占卜军国大事，因而杨何在建元六年汉武帝亲政后，也被专人迎至长安担任备顾问的博士官。黄子当为汉景帝时黄老学派的领袖黄生。“子”、“生”都是尊称。《史记》提到他都不称名，可知在他们父子心目中，他的地位高于唐都、杨何，很可能是司马谈的本师。他的遗说表明他是个矛盾人物，既主张尊君卑臣，又主张维持现状。司马谈的名论《论六家要指》，证实他曾受到黄生道论的深刻影响。

司马谈大约生于汉文帝五年(前175)，在汉武帝元封元年(前110)去世，享年大约五十六岁。

据此推断，司马谈先从黄生习道论，约在前145年，即汉景帝中元五年前后，时约二十岁，从杨何学《易》，则必在前134年，即汉武帝元光元年以后，时约三十一岁后。周《易》卜筮属于术数，以数占星需要有天文星占知识做基础，而唐都曾

参加司马迁主持的“太初历”制定工作，时年最多七十岁。他起码比司马谈年长十岁才能充当老师。因此可判断司马谈从他学天官，大约在景、武之际，即公元前145至前135年之间。

司马迁出生那年，他的父亲正值“而立”之年。司马迁是独子，因而他降临人间，使司马谈快活匪浅。古代诗人请求朋友帮助自己脱离低谷而攀上大树，便吟唱道：“伐木丁丁，鸟鸣嚶嚶。出自幽谷，迁于乔木。嚶其鸣矣，求其友声！”（《诗·小雅·伐木》首章）司马谈给独子取名为迁，字子长，不正是倾注自己的心境吗？

“太史公仕于建元、元封之间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。司马谈开始做官，可能就在这一年。虽然起初充当的只是太史丞，月俸不过三十斛小米（秩二百石），却终究是太史令（即“天官”）的副手，象征着远绍祖业的宿愿实现有望，正好此时得子，怎会不以为“迁于乔木”指日可待呢？

司马谈终于升任太史令了，时间大约在他迁居茂陵（今陕西兴平东南茂乡）以后。茂陵是汉武帝为自己营造的坟墓，照例要移民充实陵县，于是在元朔二年（前127）下诏“徙郡国豪强及资三百万以上于茂陵”（《汉书·武帝纪》元朔二年）。司马谈的家财未必值钱三百万，但他祖宗八代内有五代获得秦汉官爵，便足以登上“郡国豪杰”的名单，何

况他当时已跻身于朝廷命官行列。

于是，司马迁便成为“茂陵显武里”人。那时他大约九岁。

三、宦学生涯

未来的历史学家司马迁，由僻远的夏阳到了喧闹的茂陵，无异进入一个难得的课堂。

汉朝的陵县户口政策，在首都长安附近，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卫星城市。茂陵是最新的一个，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富豪家族，多半都是景、武之际的新贵和暴发户。他们带来了自己的财产和奴婢，带来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。诸陵县的共同特点，所谓五方杂处，风俗不纯，“其世家则好礼文，富人则商贾为利，豪杰则游侠通好”（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），在茂陵更其如此。不消说，这里堪称汉武帝时代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。

在茂陵，司马迁由少年成长为青年，度过了人生求知欲和好奇心最旺盛的十年。从这里，他看到了各色人等的脸谱，看到了不同等级的生活，也看到了当代上层社会的概貌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他所描述的秦汉之际和汉兴以后各类人物的活动，如果没有这一段经历，那就不可能如此栩栩

如生。

汉武帝元朔三年(前126),司马迁十岁了。

“人生十年曰幼学”(《礼记·曲礼上》)。他已到了那时人们认为应当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龄。司马谈对儿子既然抱有那么大的期望,对他的教育当然格外费心。启蒙教育,大概是父亲自己承担的,不过,正规教育则非拜名师不可。

说来也怪,司马谈本人属于黄老学派,可能算是这个学派在理论上的最后一位大师。但他替爱子寻得的两位导师,却是西汉儒家学派两位赫赫有名的大师,即孔安国和董仲舒。

据司马迁记载,孔安国为孔子的十一世孙。他是西汉《鲁诗》学派宗师申培的弟子,但以通晓《尚书》知名。但他由以起家的《尚书》,版本却不同于汉武帝时立为官方教科书、用汉朝通行文字隶书记录的《今文尚书》,而是从曲阜孔子故宅墙壁里发现的用秦朝文字改革前篆书写成的《古文尚书》。它比《今文尚书》多十六篇,由孔安国首先将它译成通行的隶书。但这个版本没有得到西汉政府的承认,所以孔安国虽然因为老师的缘故在汉武帝亲政后被任命为博士,但只准传授《鲁诗》,他希望把《古文尚书》等“孔壁古文”立为官方教科书的打算,终生也没有实现。但在私下仍然传授用古文写成的儒家经典,其弟子中,最出名的就

是兕宽和司马迁。

司马迁自称“年十岁则诵古文”(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)。《汉书》特别指出“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”(《汉书·儒林传孔安国传》。按“问故”，或以为“故”乃“古文”二字连文，但只要知道古书直行书写，便知不可能有此错误)。因而，孔安国是他的本师，给他以难忘的影响，而且教给他的是用秦以前古文字写成的经典，都是可以证实的。

董仲舒在历史上曾被赋予过大的名声，常被称作说服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作俑者，那与历史实际不符，在前已有说明。但他是西汉的《春秋》学专家，运用所谓“《春秋》诛心”的原则，为西汉王朝企求通过法律形式推进君主专制提供了理论说明，把荀况以来世俗化的儒学改造成神学化的经学，则是他的历史业绩。

《史记》作者自序屡说“余闻董生曰”，可谓司马迁确曾拜董仲舒为师的自白。董仲舒卒于元鼎二年(前115)，而司马迁于前一年便外出旅游，可知他跟随董仲舒问学，必定在十九岁前家居茂陵期间。

司马迁相当了解董仲舒的《春秋》学，并采取半肯定半否定的态度。

那时代，书籍是手抄的，做学问全靠老师口授，得投一位名师已是莫大幸运，而年轻的司马